

家族控制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陈元^{1,2} 贺小刚^{1,3} 徐世豪¹

(1.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433;

2. 武汉轻工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48;

3.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0)



内容提要:加快推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是“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家族控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所嵌入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族控制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且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这一影响效应越大,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这支持了“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从成因机制来看,家族控制主要是通过强化家族领导模式意愿、降低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入驻开发区的技术嵌入与区域儒家文化的文化嵌入弱化了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效应。创始人在位时,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更为明显;而二代参与和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条件下,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有所减弱。本文为数字时代驱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企业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家族控制 民营企业 数字化转型 社会情感财富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3)05—0099—17

一、引言

推动企业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围绕这一主题,大量研究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区域技术水平、经济条件、政府政策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约或促进,也有少数研究将视角转向微观组织和个体层面。前者围绕企业的功能使命(戚聿东等,2021)^[1]、资源与能力(侯光文和刘青青,2022)^[2]探寻数字化转型的内因;后者则聚焦高管网络资源(宋晶和陈劲,2022)^[3]、人口特征及特殊经历(张昆贤和陈晓蓉,2021)^[4]的影响作用。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其自身特征尤其是产权属性的影响不容忽视。产权性质的差异意味着企业在产权结构、资源禀赋和制度逻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胡一帆等,2005)^[5],这也是塑造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国家功能使命提高了其开展数字化

收稿日期:2022-04-12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创新与责任:创始人印记与家族企业决策行为研究”(7227209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族控制与企业竞争行为研究”(71972121);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岗位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陈元,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与组织,电子邮箱:cheryl_chenyuan@163.com;贺小刚,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与组织,电子邮箱:hxg99@hotmail.com;徐世豪,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略与组织,电子邮箱:xsh@163.sufe.edu.cn。通讯作者:徐世豪。

战略变革的可能(戚聿东等,2021)^[1]。从我国现实情境来看,民营企业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且大部分民营企业由家族所有和经营。因此,有必要关注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家族控制的治理模式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

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意味着一场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其在创造巨大潜在价值的同时也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高成本,是一种典型的冒险性决策(李琦等,2021^[6];Hoskisson等,2017^[7])。过往有关家族控制与冒险性决策的研究大多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相关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对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厌恶会遏制企业的研发创新(Chrisman和Patel,2012)^[8]、并购(Gómez-Mejía等,2018)^[9]、国际化(Liang等,2014)^[10]、对外合作(贺小刚等,2016)^[11]等冒险性决策。但也有研究认为,家族所有权和影响力会加强企业扩大社会情感财富的意愿,促使它们承担风险(Gómez-Mejía等,2007)^[12]。整体来看,先前研究尚未关注到数字化转型这一新兴的冒险性决策,且对家族控制与冒险性决策间的关系也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认为这可能与以下两方面有关:其一是缺乏对社会情感财富的分类考量。社会情感财富是一个宽泛的多维概念,囊括了家族从企业获得的各种情感与社会利益,不同维度对冒险性决策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朱沅等,2016)^[13]。其二是缺乏对中国特殊情境因素的考虑。围绕家族控制与冒险性决策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行为理论(Chrisman和Patel,2012)^[8]、代理理论(王博霖等,2021)^[14]、心理所有权理论(Rau等,2019)^[15]等视角挖掘其权变因素,尚未将其与企业所嵌入的中国独特制度因素相结合。

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的分类框架提出家族控制治理模式的“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及“成长与持续发展”假说,以厘清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并进一步考察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基于2007—2020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重点探究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其背后的主导逻辑是什么?二者间的关系是否会因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相较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研究。目前,理论界主要从宏观层面的技术、经济、政策(Tsou和Chen,2021^[16];毛宁等,2022^[17];杨贤宏等,2021^[18]),以及高管个体层面的资源、特征与印记(宋晶和陈劲,2022^[3];张昆贤和陈晓蓉,2021^[4])等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本文则以家族控制为切入点,深入到企业不同的产权属性,这是对既有关注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相关研究的补充与拓展。第二,拓展了企业冒险性决策的研究范畴及内在机理。与过往研究重点关注研发创新(Chrisman和Patel,2012)^[8]、国际化(Liang等,2014)^[10]等冒险性决策不同,本文将数字化转型视为一种典型的冒险性决策,并通过解构社会情感财富的不同维度,明晰了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传导机制,为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的冒险性决策提供了新的见解。第三,本文充分结合中国制度与文化的属性,将制度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相整合,拓展了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边界条件,深化了中国本土情境的管理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家族控制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借助前沿数字技术与硬件系统来推动企业生产资料与生产过程的数字化,从而形成有效的创新产出和应用,达到提质增效的重要战略(吴非等,2021)^[19]。先前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周期长、见效慢,从软硬件设施的购入到人力资源培训,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余典范等,2022)^[20],数字化转型在革新市场拓展方式和价值创造逻辑的同时,伴随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李琦等,2021)^[6]。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典型的冒险性决策,较高的资源投入、转型过程的复杂性、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尤为困难。与此同时,家族

控制在我国民营企业中十分普遍,控制性家族往往可以通过掌握企业的所有权或者经营权影响企业的行为和决策(李路路和朱斌,2014)^[21]。那么,家族控制的治理模式将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是本文重点探究的理论问题。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家族控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通常将保存或增加社会情感财富作为决策参照点(Chrisman和Patel,2012^[8];Gómez-Mejía等,2018^[9];贺小刚等,2016^[11])。但这些研究大多将社会情感财富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会导致企业的保守战略,这就掩盖了不同维度社会情感财富的潜在差异。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解构社会情感财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4)^[22]的约束型和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分析框架。前者的核心是维护家族控制,表现为家族主导的领导模式和风险规避的战略保守主义;后者的核心是创造公司长期福祉,表现为跨代传承的强烈意愿、能力至上的领导模式和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视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究竟是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还是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在发挥作用?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将基于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4)^[22]的分析框架,从“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和“成长与持续发展”假说两个视角阐述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逻辑关系^①。

(1)“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当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以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为决策参照点时,由于担心家族控制受到威胁,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会更低。具体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数字化转型的专业人才将会威胁家族的过程控制权。相较于非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家族控制企业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家族成员的涉入。受制于家族利他主义和群体内认同的影响,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雇佣家族成员,即使其管理能力和知识储备较为欠缺(Banalieva和Eddleston,2011)^[23],尤其是在核心管理岗位的设置上,家族成员更是占据绝对优势。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不仅需要特定的技术人才来保障数字化业务的嵌入与融合,而且也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员基于新的业务和市场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拓展与革新(宋晶和陈劲,2022^[3];Barrett等,2015^[24]),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家族所有者的控制地位。此外,非家族人才的引进还会导致家族与非家族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Chrisman和Patel,2012^[8];朱沅等,2016^[13]),进一步加剧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

第二,数字化转型的外部资金补充威胁家族的股权控制力。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特质的技术变革(李琦等,2021)^[6],它要求企业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化的数字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到企业现有的生产体系。在此过程中,企业需要为更换原有生产设备、改变资产结构及管理模式支付高昂的协调成本,这依赖于大量且持续的资金投入(宋晶和陈劲,2022^[3];Barrett等,2015^[24])。为了保障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顺利推进,企业必须通过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等渠道获取所需的经济资源。但外部投资者往往会对企业的战略、资金运用和管理提出监督要求。即外部资金的引入会降低家族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进而对家族控制产生威胁。

第三,数字化转型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威胁家族的风险控制能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李琦等,2021)^[6]。《2019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报告就曾指出,虽然67%的企业认为未来首要增长动能来自“数字技术+商业”,但目前仅有9%的中国企业转型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贸然数字化转型并不总是意味着企业价值的提升(刘淑春等,2021^[25];Nwankpa和Datta,2017^[26])。一旦转型失败就可能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最终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家族控制的意义也不复存在。

(2)“成长与持续发展”假说。当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以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为决策参照点时,家族会优先考虑跨代传承、人才发展和企业的持续发展,其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会更高。具

① 作者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体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跨代传承的美好愿望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家族企业是家族后代就业、创造财富的重要载体,其战略持续性源自家族对价值观和声誉的跨代延续(朱沆等,2016)^[13]。当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成为决策重心时,激励后代培育公司的长期福祉、实现跨代传承就成为了家族企业的重要目标(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4)^[22]。跨代传承目标的确立有利于激发家族的未来导向和长期导向(Chrisman和Patel,2012^[8];朱沆等,2016^[13]),进而激发企业的长期战略承诺。因此,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格局、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跨代传承的美好愿望将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第二,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目标有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有助于塑造能力至上的公司治理理念,即能力将被作为企业挑选人才的重要标准(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4)^[22]。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这种包容与开放的人才战略会促进管理人员(尤其是非家族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平等交流,为知识共享与信息互补创造条件。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接受度,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各种潜在问题的能力,从而确保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具有较高需求(宋晶和陈劲,2022^[3];Barrett等,2015^[24])。因此,当企业秉持能力至上的公司治理理念时,其还能够吸引更多专业人才以优化企业管理团队的结构,从而不断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力。

第三,持续发展的战略视野可引导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当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成为决策重心时,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长期导向。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其不仅愿意对产品、工艺流程的升级进行慷慨投资,而且也更愿意承担持续投资的风险,实施战略革新(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4)^[22]。虽然数字化转型难以规避不确定性和高成本的问题(李琦等,2021)^[6],但它也是企业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实现颠覆性技术变革的重要机遇。这与企业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视野不谋而合,有助于引导其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维持基业长青。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_{1a}:基于“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家族控制会抑制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非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更低,且家族涉入程度越高,其阻碍效应越大。

H_{1b}:基于“成长与持续发展”假说,家族控制会促进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非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且家族涉入程度越高,其促进效应越大。

2. 制度情境嵌入的影响

企业组织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其各项战略决策都将受制于制度因素的影响。已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是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陈玉娇等,2022)^[27]。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纳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拓展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尤其是对企业所嵌入的中国本土化制度情境的考虑。本文将重点考察开发区的技术嵌入和儒家文化的文化嵌入两方面影响作用。

(1)技术嵌入的影响。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借助前沿技术来推动生产资料与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吴非等,2021)^[1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日益兴起(杨婵等,2021)^[28],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推动数字转型已然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各开发区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技术型开发区中,政府期望、技术氛围和科研实力塑造了独特的技术制度环境,这势必会对嵌入在园区内的微观企业主体的决策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认为,入驻开发区的技术嵌入将通过制度的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压力促成家族控制的

风险承担和长期视野,从而激励其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首先,入驻开发区的企业在享有税收减免、金融支持等优势的同时承担着相应的制度责任(杨婵等,2021^[28];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29])。近年来,各省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园区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与规划。在此背景下,园区内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开发区目标同构,即数字化转型成为家族企业的重要战略目标。其次,在数字经济的引领下,开发区企业数字化已成大势。虽然数字化转型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随着开发区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其他企业模仿同构的压力将显著增加。如果长期无法跟上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园区内的家族企业就难以维持组织的持续竞争优势和合法性(陈玉娇等,2022^[27];DiMaggio和Powell,1983^[30]),进而对企业生存和家族声誉造成威胁。最后,园区内企业的互动会形成组织间特定的标准与规范。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园区内的商业生态系统逐渐转变,这将对企业构成新的合法性约束(陈玉娇等,2022)^[27]。与此同时,园区内的技术资源溢出效应也为企业进行规范同构创造了可能(杨婵等,2021)^[28]。家族企业只有适时推进数字化转型,才能维持区域内生产交易活动和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入驻开发区的技术嵌入将促进家族控制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2)文化嵌入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强调形成有效的创新产出和应用(吴非等,2021)^[19]。已有研究表明,优秀传统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赋能效应。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中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传统文化之一,这种特殊的文化嵌入塑造了企业组织或社会个体普遍尊崇的纲常伦理和行为规范(金智等,2017)^[31]。

本文认为,区域儒家文化的文化嵌入将通过制度的规范性压力提高家族企业接纳外部人才与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首先,儒家文化的“忠信”伦理有利于提高控股家族与代理人、投资者之间的信任水平(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32];古志辉,2015^[33])。在儒家文化较强的区域,“民无信不立”的道德约束在抑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同时,也降低了控股家族对非家族成员侵蚀家族权威的担忧。其次,儒家文化的人才观念有利于弱化家族企业对外部人员的排斥。《诗经·大雅·文王》有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当家族企业身处强儒家文化区域时,儒家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理念将提高其对外部人才的包容度,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智力支持(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32]。最后,儒家文化的革故鼎新有利于促进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目前理论界对儒家文化与创新的关系仍存争议,包括“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激励效应与“中庸之道”的桎梏效应(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32]。但相较于非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群体内信任水平,对家族成员的失败容忍度也更高,这与先前学者支持儒家文化创新激励效应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32];陈刚和邱丹琪,2021^[34])。即区域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有助于激发创新变革动力,从而提高企业承担数字化转型风险的意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₃:区域儒家文化的文化嵌入将促进家族控制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且数字化工具的广泛使用出现在2006年以后,本文将2007年作为数据的起始点(李琦等,2021^[6];吴非等,2021^[19]),建立了一个包含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基础数据库。其中,企业基本信息、注册地址、财务指标、数字化转型等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开发区信息主要通过《中国开发区年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中国开发区网等渠道获取;儒家文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国孔庙保护协会。为确保数据的质量,本文还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巨潮资讯网等渠

道对样本数据进行核查。在剔除金融类样本、ST、ST*等经营异常的样本以及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获取2564家民营上市公司的17086个企业一年度观测值。

2.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igC*)。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构建数字化生态共同体的重要标志,包括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维度。前者是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层技术构架,即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后者重点关注具体的数字化业务场景应用,如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数字营销、无人零售等(吴非等,2021)^[19]。借鉴已有研究(吴非等,2021^[19];陈玉娇等,2022^[27]),本文将上市公司年报中上述五类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频加总之和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指标,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此外,本文还根据上述指标的细分维度及数字技术无形资产比的客观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基本一致。

(2)解释变量:家族控制(*FamC*)。参考现有研究(徐世豪等,2022^[35];De Massis等,2018^[36]),当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属于某个家族,且有亲属成员为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单位的股东或董监高时,则将家族控制赋值为1,否则为0。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家族成员在目标公司实际持有的股份之和,即家族持股比例(*FamS*)作为家族控制连续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当样本民营企业满足上述家族控制的条件时,则家族持股比例以家族成员实际所持有的股份之和计量;当不满足家族控制的条件时,即样本民营企业为非家族企业,则将家族持股比例记为0。此外,本文还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Chrisman和Patel,2012^[8];贺小刚等,2016^[11])更换了家族控制的界定标准。

(3)调节变量:开发区(*Zone*)与儒家文化(*ConC*)。就开发区而言,本文聚焦技术型开发区的技术嵌入,具体是根据企业地址信息与开发区地址信息的匹配设定企业是否入驻开发区的虚拟变量。即若企业地址信息的文本字段有代表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特定字样,则将入驻开发区设定为1,否则为0(杨婵等,2021)^[28]。为排除企业因搬迁而进行资产重组的影响,本文仅保留近三年内注册地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更的样本。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根据是否入驻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否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定细分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就儒家文化而言,现有研究发现孔庙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场所,一个区域内孔庙分布越密集,意味着历史上这一区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深(金智等,2017^[31];李文佳和朱玉杰,2021^[37])。基于此,本文以企业注册所在地现存孔庙数量的对数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指标。另外,本文还利用历史孔庙总数的对数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4)控制变量。本文对可能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变量进行控制:第一,企业自身特征是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在因素(侯光文和刘青青,2022)^[2],故在企业层面本文控制了:①企业年龄(*Age*),以当年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衡量;②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③资产负债率(*Debt*),以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④研发投入(*R&D*),以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衡量。第二,公司治理特征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决策制定(戚聿东等,2021)^[1],故在公司治理层面本文控制了:①独董比例(*IndB*),以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员总数的比值衡量;②两职合一(*Duality*),若公司董事长兼任CEO则赋值为1,否则为0。第三,创始人的个体特征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宋晶和陈劲,2022)^[3],故在个体层面本文控制了:①创始人年龄(*FounA*);②创始人学历(*FounE*),用数字1~5分别表示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第四,区域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容忽视(陈玉娇等,2022)^[27],故在区域层面本文控制了:①市场化程度(*MarD*),采用王小鲁等(2019)^[38]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来衡量;②中心城市(*CenC*),若企业注册所在地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则设定为1,否则为0(赵涛等,2020)^[39]。为剔除极端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相关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3. 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以下模型检验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DigC_{i,t+1} = \alpha_0 + \alpha_1 FamC_{i,t} + \alpha_2 X_{i,t} + \lambda + \mu + \varepsilon_{i,t} \quad (1)$$

$$DigC_{i,t+1} = \alpha_0 + \alpha_1 FamC_{i,t} + \alpha_2 Mod_{i,t} + \alpha_3 Mod_{i,t} \times FamC_{i,t} + \alpha_4 X_{i,t} + \lambda + \mu + \varepsilon_{i,t} \quad (2)$$

模型(1)用于检验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关系,其中, $DigC_{i,t+1}$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 $FamC_{i,t}$ 为解释变量,代表企业是否为家族控制; $X_{i,t}$ 代表控制变量; λ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μ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若 H_{1a} “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成立,则 α_1 应显著为负;若 H_{1b} “成长与持续发展”假说成立,则 α_1 应显著为正。模型(2)用于调节效应的检验,其中, $Mod_{i,t}$ 代表影响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调节变量,包括企业是否入驻开发区和区域儒家文化。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1可知,上市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为1.168,标准差为1.38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071。这说明,当前我国不同民营企业之间的数字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另外,家族控制的均值为0.654,标准差为0.476。这说明家族控制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治理模式之一,凸显了本文基于家族控制的视角考察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DigC</i>	17086	1.168	1.383	0.000	6.071
<i>FamC</i>	17086	0.654	0.476	0.000	1.000
<i>FamS</i>	17086	0.288	0.245	0.000	0.778
<i>Zone</i>	17086	0.259	0.438	0.000	1.000
<i>ConC</i>	17086	2.887	0.731	0.000	4.060
<i>Age</i>	17086	2.705	0.421	0.000	4.127
<i>Size</i>	17086	21.610	1.081	15.577	26.859
<i>Debt</i>	17086	0.369	0.195	0.044	0.862
<i>R&D</i>	17086	14.584	6.641	0.000	23.007
<i>IndB</i>	17086	0.376	0.052	0.333	0.571
<i>Duality</i>	17086	0.376	0.484	0.000	1.000
<i>FounA</i>	17086	53.511	8.935	33.000	79.000
<i>FounE</i>	17086	2.993	1.125	1.000	5.000
<i>MarD</i>	17086	8.214	1.687	-0.230	10.000
<i>CenC</i>	17086	0.511	0.500	0.000	1.000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表^①显示,家族控制、家族持股比例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初步验证了 H_{1a} “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其余变量的相关系数基本小于0.3,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的结果也显示VIF的最大值为1.43,平均值为1.19,远小于10的经验阈值,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讨论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下文将做进一步的统计处理。

2. 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2列示了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仅包括控制变量,第

① 限于篇幅,相关系数表未列示,备索。

(2)列和第(3)列分别加入解释变量家族控制、家族持股比例,第(4)列和第(5)列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影响。表2第(2)列的结果表明,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beta = -0.059, p < 0.01$),说明相对于非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更低。第(3)列的结果表明,家族持股比例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beta = -0.185, p < 0.01$),说明家族持股比例越高,民营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越低。第(4)列和第(5)列的结果表明,在控制行业时间趋势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由此,本文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 H_{1a} ,反向证伪竞争性假设 H_{1b} 。即家族控制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是其数字化转型决策的重要参照点。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FamC</i>		-0.059*** (0.019)		-0.054*** (0.019)	
<i>FamS</i>			-0.185*** (0.036)		-0.175*** (0.036)
<i>Age</i>	-0.110*** (0.023)	-0.114*** (0.023)	-0.120*** (0.024)	-0.111*** (0.024)	-0.117*** (0.024)
<i>Size</i>	0.146*** (0.010)	0.146*** (0.010)	0.145*** (0.010)	0.146*** (0.010)	0.146*** (0.010)
<i>Debt</i>	-0.082 (0.052)	-0.085 (0.052)	-0.096* (0.052)	-0.090* (0.053)	-0.100* (0.053)
<i>R&D</i>	0.020*** (0.002)	0.020*** (0.002)	0.021*** (0.002)	0.021*** (0.002)	0.021*** (0.002)
<i>IndB</i>	0.758*** (0.167)	0.774*** (0.167)	0.812*** (0.168)	0.766*** (0.169)	0.803*** (0.169)
<i>Duality</i>	0.045** (0.018)	0.047** (0.018)	0.048*** (0.018)	0.045** (0.018)	0.046** (0.018)
<i>FounA</i>	-0.007*** (0.001)	-0.007*** (0.001)	-0.007*** (0.001)	-0.007*** (0.001)	-0.007*** (0.001)
<i>FounE</i>	0.070*** (0.008)	0.067*** (0.008)	0.065*** (0.008)	0.067*** (0.008)	0.064*** (0.008)
<i>MarD</i>	0.064*** (0.005)	0.065*** (0.005)	0.067*** (0.005)	0.064*** (0.005)	0.066*** (0.005)
<i>CenC</i>	0.295*** (0.018)	0.294*** (0.018)	0.294*** (0.018)	0.294*** (0.018)	0.294*** (0.018)
常数项	-3.640*** (0.224)	-3.638*** (0.224)	-3.613*** (0.224)	-3.476*** (0.253)	-3.455*** (0.250)
行业/时间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 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调整 R^2	0.364	0.365	0.365	0.366	0.367
观测值	17086	17086	17086	17086	17086

注: *、**和***分别表示 $p < 0.10$ 、 $p < 0.05$ 和 $p < 0.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3. 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检验

上文验证了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本部分旨在挖掘其间的作用机制。

基于“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核心是维护家族控制,表现为家族主导的领导模式和风险规避的战略保守主义。但数字化转型的专业人才需求和外部资金需求会威胁到家族控制强化家族主导领导模式的意愿,而数字化转型的失败风险则与家族控制的风险规避主义相悖。因此,出于对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维护,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会表现出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即强化家族主导的领导模式和风险规避的战略保守主义可能是家族控制阻碍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机制。

一方面,为验证强化家族主导的领导模式的机制,本文以家族董监高比例 (*DJG*) 衡量,其比例越高,代表企业强化家族主导领导模式的动机越强;另一方面,为验证风险规避的战略保守主义机制,本文以企业盈利波动性衡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RiskT*)。盈利波动性越大,说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风险规避程度越低(何瑛等,2019^[40];余明桂等,2013^[41])。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根据模型(3)对企业每一年的 *ROA* 采用行业平均值进行调整,以缓解行业及周期的影响。然后,根据模型(4)以每三年作为一个观测时段,滚动计算经行业调整后的 *ROA* 的标准差,最终得到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指标。

$$Adj_ROA_{i,n} = \frac{EBITDA_{i,n}}{ASSET_{i,n}} - \frac{1}{X} \sum_{k=1}^X \frac{EBITDA_{i,n}}{ASSET_{i,n}} \tag{3} \textcircled{1}$$

$$RiskT_i = \sqrt{\frac{1}{N-1} \sum_{n=1}^N (Adj_ROA_{i,n} - \frac{1}{N} \sum_{n=1}^N Adj_ROA_{i,n})^2} \tag{4} \textcircled{2}$$

表 3 列示了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的 *FamC* 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家族控制会显著强化企业维护家族主导领导模式的意愿,表现为更高水平的家族董监高比。第(2)列中 *FamC* 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DJG* 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族主导的领导模式会阻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3)列的 *FamC* 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家族控制会降低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第(4)列中 *FamC* 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RiskT* 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通过 Sobel 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家族领导模式与风险承担水平的机制效应。在替换家族控制的测量方式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即家族控制主要是通过强化家族主导的领导模式和风险规避的战略保守主义进而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与假设 H_{1a} “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的逻辑一致。

表 3 机制检验:家族领导模式与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

变量	(1)	(2)	(3)	(4)	(5)	(6)	(7)	(8)
	<i>DJG</i>	<i>DigC</i>	<i>RiskT</i>	<i>DigC</i>	<i>DJG</i>	<i>DigC</i>	<i>RiskT</i>	<i>DigC</i>
<i>FamC</i>	0.001* (0.001)	-0.059*** (0.019)	-0.003*** (0.001)	-0.050** (0.020)				
<i>FamS</i>					0.031*** (0.002)	-0.172*** (0.036)	-0.016*** (0.002)	-0.149*** (0.040)
<i>DJG</i>		-0.495*** (0.147)				-0.407*** (0.149)		
<i>RiskT</i>				0.879*** (0.193)				0.848*** (0.193)

① 其中, *Adj_ROA* 代表经行业调整的 *ROA* 值, *EBITDA* 代表息税前利润, *ASSET* 代表资产总额。 *i* 代表企业, *n* 代表在观测时段内的年度, 取值 1~3。 *X* 代表某行业的企业总数量, *k* 代表该行业的第 *k* 家企业。

② *N* 代表观测时段, 取值为 3, 这是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任期一般是三年(余明桂等, 2013)^[41]。

续表 3

变量	(1)	(2)	(3)	(4)	(5)	(6)	(7)	(8)
	<i>DJG</i>	<i>DigC</i>	<i>RiskT</i>	<i>DigC</i>	<i>DJG</i>	<i>DigC</i>	<i>RiskT</i>	<i>DigC</i>
常数项	0.248*** (0.011)	-3.516*** (0.227)	0.192*** (0.015)	-3.374*** (0.248)	0.243*** (0.011)	-3.514*** (0.227)	0.193*** (0.015)	-3.361*** (0.2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113	0.365	0.069	0.371	0.127	0.365	0.073	0.371
观测值	17086	17086	14915	14915	17086	17086	14915	14915
Sobel 检验	Z = -1.454		Z = -3.019***		Z = -7.018***		Z = -5.614***	

本文也对假设 H_{1b}“成长与持续发展”假说的机制进行证伪。其中,假设 H_{1a}家族主导领导模式的机制得到验证,即反向证伪假设 H_{1b}能力至上领导模式的机制;假设 H_{1a}风险规避战略保守主义的机制得到验证,即反向证伪假设 H_{1b}持续发展战略视野中的风险偏好机制;但假设 H_{1a}中并无与假设 H_{1b}跨代传承与企业持续发展所激发的长期导向相对应的机制,故本文利用公司愿景中具有赶超特征的关键词总数及其词频测量公司的长期导向,以验证其可能发挥的机制作用。结果表明,家族控制、家族持股比例与长期导向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长期导向的作用机制并未得到验证,假设 H_{1b}“成长与持续发展”假说不成立,这进一步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①。

4. 调节效应检验

本部分主要检验入驻开发区及区域儒家文化对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表 4 第(1)列和第(3)列用于检验开发区的调节效应。第(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开发区与家族控制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 = 0.135, p < 0.01$)。第(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开发区与家族持股比例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正($\beta = 0.429, p < 0.01$)。这说明入驻开发区的技术嵌入能够有效遏制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碍作用,即相较于家族控制的非开发区企业,那些由家族控制的开发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假设 H₂ 得到支持。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i>Zone</i>	0.089*** (0.033)		0.057* (0.030)	
<i>ConC</i>		0.017 (0.018)		0.021 (0.016)
<i>FamC</i>	-0.096*** (0.021)	-0.403*** (0.066)		
<i>FamC</i> × <i>Zone</i>	0.135*** (0.041)			
<i>FamC</i> × <i>ConC</i>		0.118*** (0.023)		
<i>FamS</i>			-0.269*** (0.040)	-0.936*** (0.128)
<i>FamS</i> × <i>Zone</i>			0.429*** (0.084)	
<i>FamS</i> × <i>ConC</i>				0.259*** (0.044)
常数项	-3.625*** (0.224)	-3.685*** (0.229)	-3.585*** (0.224)	-3.684*** (0.2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368	0.367	0.369	0.368
观测值	17086	17086	17086	17086

① 限于篇幅,正文未列示,备索。作者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表4第(2)列和第(4)列用于检验儒家文化的调节效应。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与家族控制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 = 0.118, p < 0.01$)。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与家族持股比例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正($\beta = 0.259, p < 0.01$)。这说明儒家文化的文化嵌入将对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即企业所处地区的儒家文化越浓厚,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越弱,假设 H_3 得到支持。

5.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本文以地市级族谱比(*Clan*)作为家族控制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借鉴潘越等(2019)^[42]的研究,本文从《中国家谱总目》中手工搜集整理了各地区的族谱数据,同时结合1990年《人口统计年鉴》中的各地级市人口数量构建地市层面的族谱比例,然后将其与上市公司注册所在地进行匹配。选择这一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族谱是记载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一般而言,族谱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地区的宗族文化氛围越浓厚。受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血浓于水、团结互惠的观念深入人心,家族治理模式的可能性显著提高(潘越等,2019)^[42]。加之,族谱数量本身也不直接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因此,地市级族谱比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工具变量。表5列示了工具变量检验的回归结果。

表5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变量	(1)	(2)	(3)	(4)
	<i>FamC</i> 第一阶段	<i>DigC</i> 第二阶段	<i>FamS</i> 第一阶段	<i>DigC</i> 第二阶段
<i>Clan</i>	0.0005***(0.0002)		0.0004***(0.0001)	
<i>FamC</i>		-4.484**(1.813)		
<i>FamS</i>				-5.148*** (1.449)
常数项	0.012(0.103)	-3.534*** (0.511)	0.138*** (0.053)	-2.877*** (0.4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087	-	0.103	-
观测值	16337	16337	16337	16337

表5第(1)列和第(3)列的结果显示,族谱比例对家族控制(家族持股比例)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地区族谱比例越高,企业越可能由家族控制(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这与本文的预期相符。此外,第一阶段回归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2)列和第(4)列的结果表明,家族控制、家族持股比例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即家族控制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上述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依旧得到验证。

(2)替换变量测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①。第一,替换解释变量。本文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更换了家族控制的界定标准,即若家族成员的持股比例大于5%且至少有1名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工作,则将家族控制设定为1,否则为0。当企业满足这一条件时,以家族成员实际持有股份之和作为家族持股比例的替代指标,否则记为0(贺小刚等,2016)^[11]。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吴非等(2021)^[19]的做法,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数字化业务场景应用五个细分维度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未列示,备案。

的指标分别进行检验。另外,本文还以数字经济无形资产比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即数字经济技术无形资产占本年度无形资产的比例(祁怀锦等,2020^[43];张永坤等,2021^[44])。第三,替换调节变量。就开发区而言,本文将其细分为是否入驻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否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儒家文化而言,在现存孔庙数量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以历史孔庙总数衡量。结果表明,在替换变量测量方式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基本稳健。但在细化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时,仅有家族控制与数字化业务场景应用之间的关系会被地区儒家文化影响。这说明儒家文化的调节效应在数字化转型的不同维度下存有差异,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另外,替换调节变量测量指标后,企业入驻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调节作用依旧成立,但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影响作用则相对有限,这说明不同类型技术开发区的技术赋能效应可能存有差异。

(3)更换研究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到自2015年,中国开始大力实施“互联网+”战略,这引致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开启新技术的战略转型(王锋正等,2022)^[45]。因此,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区间限定在2016—2020年(共计8090个观测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二,为排除本身依托数字技术的“天然数字型”企业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将样本限定在非数字技术相关行业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剔除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样本,制造业二级行业涉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的企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二级行业涉及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的企业(李琦等,2021)^[6]。第三,考虑到地区文化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可能影响,本文借鉴潘越等(2019)^[42]的做法,剔除少数民族聚居地样本后重新对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回归结果表明,在更换样本年度区间、剔除数字技术行业相关样本、剔除少数民族聚集地样本以后,家族控制、家族持股比例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依旧显著负相关,开发区和儒家文化的调节效应也得到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五、异质性分析

上文验证了“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即家族控制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身发展阶段与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可能具有差异化的表现。因此,有必要结合企业特征展开异质性研究,它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主效应研究假设的理解。本部分将从创始人任职情况、代际参与情况、企业经营状况三个视角分析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阻碍效应的异质性。

1. 创始人任职情况

创始人作为民营企业的舵手,自企业成立之初,就在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治理结构安排、战略决策制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会对企业产生持续影响(李晓溪等,2016^[46];Nelson,2003^[47])。本文认为,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在创始人在位或离任的企业中存有一定差异。相对于其他管理人员,创始人对企业的认同感和情感依恋程度更高,他们对维护家族主导的领导模式、规避家族事业风险的事项具有更高的要求。当创始人仍在企业任职时,其控制权威得以强化,这使得企业决策过程中将尤为注重以维持家族控制为核心的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从而表现出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但当创始人离任之后,其影响作用就会有所减弱。为验证上述观点,本文根据创始人是否在公司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设定创始人任职情况的关键变量,并据此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检验。

表6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家族控制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创始人在位的民营企业中显著为负,但在创始人离任的民营企业中并不显著。这说明,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在创始人在位的民营企业中更加得以体现,而对创始人离任的民营企业而言,其影响作用则相对有限。

表 6 异质性检验:家族控制与企业数字化转型^①

变量	(1)	(2)	(3)	(4)	(5)	(6)
	创始人任职情况		代际参与情况		企业经营状况	
	在位	离任	一代参与	二代参与	非经营困境	经营困境
<i>FamC</i>	-0.090*** (0.025)	0.007 (0.030)	-0.069*** (0.023)	-0.086 (0.154)	-0.073*** (0.021)	0.025 (0.047)
常数项	-3.374*** (0.298)	-3.761*** (0.351)	-3.556*** (0.290)	-2.583*** (0.665)	-3.862*** (0.244)	-3.384*** (0.7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345	0.404	0.373	0.246	0.360	0.397
观测值	11003	6083	11926	2403	14586	2500

2. 代际参与情况

在“子承父业”观念的影响下,家族二代参与公司治理是一种普遍且常见的现象。本文认为,相较于仅一代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当家族二代涉入时,家族控制企业的决策参照点将发生明显变化,即保存和增加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将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二代参与公司治理意味着企业已经开启了传承之路,故相较于仅一代参与的企业而言,其具有更长的投资视野,也更为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黄海杰等,2018^[48];Zhu 和 Kang,2022^[49]);其二,二代通常比父辈具有更高的学历水平和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对数字化转型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也更高。为了构建个人权威实现“少主服众”,其往往更愿意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黄海杰等,2018)^[48]。为验证上述观点,本文根据家族二代是否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设定二代参与的关键变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分组回归。表 6 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家族控制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一代参与的民营企业中显著为负,但在二代参与的民营企业中并不显著。这说明,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在一代参与的民营企业中更加得以体现,而对二代参与的民营企业而言,其影响作用则相对有限。

3. 企业经营状况

不同的经营状况会改变企业的决策参照点(Chrisman 和 Patel,2012)^[8]。当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家族事业处于一种绩效满意的状态,“富则思安”会导致企业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规避风险。相反,当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时,家族企业倒闭、破产的风险急剧增加。面对家族财富的巨大损失,家族所有者的压力显著增加,其追求企业持续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动力也得以激发。也就是说,经营困境将提高企业对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偏好,从而弱化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为验证不同经营状况下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作用,本文以公司每年资产收益率相对于目标水平的变化来衡量组织经营下滑水平(贺小刚等,2017)^[50],并以此为依据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两组。若企业出现组织经营下滑,则为经营困境样本,否则为非经营困境样本。表 6 第(5)列和第(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家族控制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非经营困境的民营企业中显著为负,但在经营困境的民营企业中并不显著。这说明,经营困境会提高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权重,进而弱化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利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沪深 A 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家族控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

① 本文同时基于家族持股比例进行异质性分析,所得结果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备案。

在机理,并探究了制度因素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家族控制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且家族持股比例越高,其阻碍效应越大。从作用路径来看,家族控制之所以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主要是由其维护家族主导领导模式的强烈意愿和风险规避的战略保守主义所致,这意味着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策参照点。第二,开发区的技术嵌入和儒家文化的文化嵌入弱化了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这验证了制度环境因素对家族控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间的赋能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创始人在位的企业中,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更为明显;而在二代参与、经营困境的企业中,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则有所减弱。这说明企业的决策参照点并非一成不变,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受制于企业自身状态的影响。本文丰富了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研究,拓展了企业冒险性决策的研究范畴及制度理论在其间的具体应用,为进一步深化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2. 管理启示与建议

本文对于如何推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积极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是赋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本文的研究发现,受制于维持家族领导模式的强烈意愿和风险规避的战略保守主义的影响,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存在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的问题。如何激发家族企业投身于数字化转型的内驱力?本文认为可以从战略制定和公司治理两个方面做出调整:一方面,就战略制定而言,虽然风险规避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但若合理利用其在降低风险方面的敏锐性则有助于企业实现稳中求进、渐进发展。因此,家族企业在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时要尽量规避过于激进的方案,而是采取局部到整体、渐进到突破的方案,循序渐进地接受并引入与其生产流程环节相匹配的数字技术,从而降低数字化技术涉入的成本与风险,提高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就公司治理而言,企业管理者须深刻认识到家族成员参与企业治理的“双刃剑”效应。家族企业应建立健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在强化对企业代理人监督机制的同时,提高对外部投资者及非家族管理与技术人才的包容度,最终形成家族企业主和非家族成员同心推进数字化转型、最大化企业价值创造的共赢局面。

其次,调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不容忽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入驻开发区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这说明政府利好的政策和制度是推进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部驱动力。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相关部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政府应该提供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供给:一方面,政府需要持续输出数字技术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引导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积极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比如评选行业或区域数字化转型的先进企业代表、优化数字技术企业的空间布局,从而通过行业标杆或区域示范的效应推动家族企业积极投身入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宏观政策框架,制定针对家族控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比如,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补助和优惠政策、开放数字化转型审批流程的绿色通道,从而扫清转型障碍、降低转型成本,以增强家族企业转型发展的信心和能力。

最后,地区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企业主的行为规范和战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儒家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这说明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部驱动力,这对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管理人员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于家族企业管理者而言,在企业治理过程中,亟需依托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创造出有利于传承家族事业的“本土化”管理经验。比如通过家族创业故事、家族非正式会议等方式挖掘家族成员的文化烙印,从而塑造变革、创新的家族文化,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于政府管理人员而言,在竭力优化、完善正式的市场环境之余,也应该因地制宜,挖掘辖区内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通过

举办文化展览、投放宣传视频和公益广告等方式使其与正式制度环境协同,不断优化辖区内企业的营商环境。

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首先,本文借鉴先前研究的做法,利用年报提取的关键词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以数字技术无形资产比的客观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案例研究、问卷等多种方式构建更为完善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体系。其次,本文发现儒家文化在数字化转型不同细分维度下的作用不尽相同,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区分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的逻辑丰富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最后,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从行业角度剔除了数字技术行业相关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规避“天然数字化”企业的可能影响,但尚未更精细地对其他行业样本进行逐一排查。

参考文献

- [1] 戚聿东,杜博,温馨. 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使命嵌入与模式选择——基于3家中央企业数字化典型实践的案例研究[J]. 北京:管理世界,2021,(11):137-158,10.
- [2] 侯光文,刘青青. 网络权力与创新绩效:基于企业数字化能力视角[J]. 北京:科学学研究,2022,(6):1143-1152.
- [3] 宋晶,陈劲. 企业家社会网络对企业数字化建设的影响研究——战略柔性的调节作用[J]. 北京:科学学研究,2022,(1):103-112.
- [4] 张昆贤,陈晓蓉. 谁在推动数字化? ——一项基于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视角的经验研究[J]. 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10):68-87.
- [5] 胡一帆,宋敏,张俊喜. 竞争、产权、公司治理三大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及交互关系[J]. 北京:经济研究,2005,(9):44-57.
- [6] 李琦,刘力钢,邵剑兵.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J]. 北京:经济管理,2021,(10):5-23.
- [7] Hoskisson, R. E., F. Chirico, J. Zyung, and E. Gambeta. Managerial Risk Taking: A Multitheoretical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43, (1): 137-169.
- [8] Chrisman, J. J., and P. C. Patel. Variations in R&D Investmen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Behavioral Agency and Myopic Loss Aversion Perspectiv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 (4): 976-997.
- [9] Gómez-Mejía, L. R., P. C. Patel, and T. M. Zellweger. In the Horns of the Dilemma: Socioemotional Wealth, Financial Wealth, and Acquisitions i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44, (4): 1369-1397.
- [10] Liang, X., L. Wang, and Z. Cui. Chinese Private Firm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ffects of Family Involvement in Management and Family Ownership[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14, 27, (2): 126-141.
- [11] 贺小刚,朱丽娜,王博霖,张远飞. 家族控制与对外合作: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广州:管理学季刊,2016,(3):32-59,144.
- [12] Gómez-Mejía, L. R., K. T. Haynes, M. Núñez-Nickel, K. J. L. Jacobson, and J. Moyano-Fuentes.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7, 52, (1): 106-137.
- [13] 朱沆, Kushins Eric, 周影辉. 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吗? [J]. 北京:管理世界,2016,(3):99-114.
- [14] 王博霖,贾植涵,彭屹,贺小刚. 家族控制与企业跨区域扩张: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上海: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4):85-110.
- [15] Rau, S. B., A. Werner, and S. Schell.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s A Driving Factor of Innovation in Older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 2019, 10, (4): 100246.
- [16] Tsou, H. T., and J. S. Chen. How Does Digital Technology Usage Benefit Firm Perform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s Mediators[J/OL].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2021, 1991575.
- [17] 毛宁,孙伟增,杨运杰,刘哲.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以中国高速铁路为例的实证研究[J]. 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10):47-67.
- [18] 杨贤宏,宁致远,向海凌,陈谨.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实证研究[J]. 北京:中国软科学,2021,(11):172-184.
- [19]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北京:管理世界,

2021, (7): 130 - 144, 10.

[20] 余典范, 王超, 陈磊. 政府补助、产业链协同与企业数字化[J]. 北京: 经济管理, 2022, (5): 63 - 82.

[21] 李路路, 朱斌. 家族涉入、企业规模与民营企业的绩效[J]. 北京: 社会学研究, 2014, (2): 1 - 21, 242.

[22] Miller, D., and I. Le Breton-Miller. Deconstructing Socioemotional Wealt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 (4): 713 - 720.

[23] Banalieva, E. R., and K. A. Eddleston. Home-Region Focus and Performance of Family Firms: The Role of Family vs Non-Family Lead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1, 42, (8): 1060 - 1072.

[24] Barrett, M., E. Davidson, J. Prabhu, and S. L. Vargo. Service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Key Contribu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MIS Quarterly*, 2015, 39, (1): 135 - 154.

[25] 刘淑春, 闫津臣, 张思雪, 林汉川. 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21, (5): 170 - 190, 13.

[26] Nwankpa, J. K., and P. Datta.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IT Resource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Business Intensity o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17, 26, (5): 469 - 488.

[27] 陈玉娇, 宋铁波, 黄键斌. 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行就市”还是“入乡随俗”? ——基于制度理论和认知理论的决策过程研究[J]. 北京: 科学学研究, 2022, (6): 1054 - 1062.

[28] 杨婵, 贺小刚, 闫静波. 企业国际化决策中的制度效应: 入驻开发区的视角[J]. 上海: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 (4): 19 - 33.

[29] 李力行, 申广军. 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J]. 北京: 经济学(季刊), 2015, (3): 885 - 910.

[30] DiMaggio, P. J., and W.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2): 147 - 160.

[31] 金智, 徐慧, 马永强. 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7, (11): 170 - 192.

[32] 徐细雄, 李万利. 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 文化的力量[J]. 北京: 金融研究, 2019, (9): 112 - 130.

[33] 古志辉. 儒家传统与公司绩效[J]. 济南: 制度经济研究, 2015, (1): 69 - 113.

[34] 陈刚, 邱丹琪.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一项流行病学研究[J]. 上海: 财经研究, 2021, (3): 95 - 109.

[35] 徐世豪, 贺小刚, 陈元. 兄弟姐妹共治缓解还是加剧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22, (7): 101 - 120.

[36] De Massis, A., S. Ding, J. Kotlar, and Z. Wu. Family Involvement and R&D Expenses in the Context of Weak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 Examination of Non-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2018, 24, (16): 1506 - 1527.

[37] 李文佳, 朱玉杰. 儒家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J]. 北京: 经济管理, 2021, (9): 137 - 153.

[38] 王小鲁, 樊纲, 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39] 赵涛, 张智, 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北京: 管理世界, 2020, (10): 65 - 76.

[40] 何瑛, 于文蕾, 杨棉之. 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9): 155 - 173.

[41] 余明桂, 李文贵, 潘红波.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J]. 北京: 金融研究, 2013, (1): 149 - 163.

[42] 潘越, 翁若宇, 纪翔阁, 戴亦一.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9, (7): 116 - 135, 203 - 204.

[43] 祁怀锦, 曹修琴, 刘艳霞. 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 重庆: 改革, 2020, (4): 50 - 64.

[44] 张永坤, 李小波, 邢铭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J]. 北京: 审计研究, 2021, (3): 62 - 71.

[45] 王锋正, 刘向龙, 张蕾, 程文超. 数字化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J]. 北京: 科学学研究, 2022, (2): 332 - 344.

[46] 李晓溪, 刘静, 王克敏. 家族创始人职业经历与企业财务保守行为研究[J]. 上海: 财经研究, 2016, (4): 92 - 101.

[47] Nelson, T. The Persistence of Founder Influence: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a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 (8): 707 - 724.

[48] 黄海杰, 吕长江, 朱晓文. 二代介入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J]. 天津: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1): 6 - 16.

[49] Zhu, Z., and Y. Kang. A Far-Reaching Parental Love? Co-Governa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hinese Family Firm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22, 18, (2): 358 - 394.

[50] 贺小刚, 朱丽娜, 杨婵, 王博霖. 经营困境下的企业变革: “穷则思变”假说检验[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1): 135 - 154.

Family Control and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HEN Yuan^{1,2}, HE Xiao-gang^{1,3}, XU Shi-hao¹

(1.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48, China;

3. Zhejiang Colle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hua, Zhejiang, 321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smallest component of macroeconomic operation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the basis for ensur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OEs have been given a new mission of state fun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greatly increases their potential for strategic digital chang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theoretical attention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specially family-own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family control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firms, and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mily control hinder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firms, and the higher the family shareholding, the larger the effect is. In the mechanism test, we find that family control mainly hinder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y strengthening the family's willingness to control and reducing the level of risk-taking. (2) Located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and the intensity of regional Confucian culture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family control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firms. (3)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hindering effect of family control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samples where the founder is present, only one generation is involved, and those without performance decline.

The m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paper takes family control as the entry point and it enriches the study of anteceden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cond, this paper conside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 typical managerial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clarifies the mechanism of family control hinde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y deconstructi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ocioemotional wealth, which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firm's managerial risk-taking behavior. Third, this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attributes of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and integrates institutional theory with socioemotional wealth theory, which deepens the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local context.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irst, family enterprises should establish a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enhance the tolerance of external talents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corporate agents.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send positive signal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an help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optimize the macro policy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so as to guide family enterprises to proactively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nally, while government managers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formal market environment, they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local conditions and tap into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ir jurisdictions.

This paper also has some limitations. Firs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construct a more complete indicator system for meas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rough various approaches such as case studies, questionnaires, and secondary data. Second, in terms of sample selection, this paper excludes samples related to the digital technology industry from the industry perspective for robustness testing, which can avoid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natural digital"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has not been more refined to check the samples of other industries one by one. Finally, the measure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is treated as a dummy variable only, future research can distinguish the rol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etc. in refining the effect of development zones.

Key Words: family control; privat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cioemotional wealth

JEL Classification: G32, G34, M10

DOI: 10.19616/j.cnki.bmj.2023.05.006

(责任编辑:李先军)